

人类学视野下华人移民的非理性因素研究

——以南美洲厄瓜多尔华人移民为观察视点

杜洁莉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55)

摘 要:以南美洲厄瓜多尔华人移民为观察视点,人类学意义下移民概念的界定不是简单以时空迁移作为依据,而是具有更多情感性因素,华人移民更多时候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华人移民动因并非是简单的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经济推拉移民,而是存在更多非理性因素,华人移民文化适应过程也并非单一的“同化论”一元论和“本文化-异文化”二元论,而是具有不明确边界的多元论。

关键词: 移民;非理性因素;过程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C 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225(2015)02-0076-06

一、移民概念的人类学阐释

所谓“移民”,是指人口分布在空间位置上的变动。学术界对人口迁移的概念存在多种界定。联合国《多种语言人口学辞典》关于人口迁移的定义为:

“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地理流动或者空间流动,这种流动通常会涉及到永久性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变化。这种迁移被称为永久性迁移,它不同于其他形式的、不涉及永久性居住地变化的人口移动。”(United Nations)^[1]这一概念引申出人口迁移的两个重要属性:“永久性”的时间属性和“跨界性”的空间属性。

此外,有专家指出:“移民”的定义还应该具有法律结果的迁移,即指入了居住地的户籍。未取得户籍的人,即使在居住地已居住了较长的时间,也不能算“移民”。^[2]

从人类学的研究视野看,上述“移民”概念的界定略显狭窄。单一的时间、空间、户籍不足以阐释人类迁移状态中的文化属性。华人“移民”身份的确定还应涉及到一种归属感的思辨。归属感不

能简单地与定居或者迁移联系在一起。人类永久性地迁移到新的行政区域,但是却由于来自对迁移的抵制产生无家可归的感觉或矛盾,产生对边界的抗拒,这种“无家”之感使其移民身份具有不确定性。

因而,在人类学意义上解读“移民”,不能以单一的时间、空间进行界定,而应是一种社会、精神意思上的界定。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中,移民存在更多精神性的、非理性的因素,是一种过程性研究。

二、移民理论的文献基础与时代困境

国际上关于移民动因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移民的研究。莱温斯坦(E.G.Ravenstein)等人提出的“推-拉”理论^[3],即认为移民的动因在于迁出地和迁入地(通常迁出地是农村,迁入地是城市)存在经济等社会因素方面的差异,不是盲目无序的流动,而是迁出地的不利因素导致的“推”力和迁入地的各种有利条件形成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等提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现代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生产中形成了

收稿日期 2014-05-03

作者简介 杜洁莉(1979-),女,广东汕头人,人类学博士,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双重劳动力市场”,外来移民承担了本地居民所不愿意从事的低层次劳动力市场。^[4]国际移民分工理论(历史—结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阿莱亚多·波斯特(Alejandro Portes)和萨斯奇亚·萨森(Saskia Sassen-Koob)则认为,全球化过程中存在区域性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第三世界国家输入劳工,形成了第三世界边缘国家对发达中心国家的依附,移民事实上是服务于资本的廉价劳动力。^[5]发展经济学的人口迁移理论以刘易斯和托达罗模型为代表。刘易斯模型是以城市“充分就业”为前提假设,认为城市的就业机会以及较高的劳动边际收益率引发了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输入,移民是属于工业部门所吸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6]

以上移民理论是基于发展中地区向发达地区的移民,移民目的地通常都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相对迁出地而言具有优势条件;二是存在低层次劳动力需求的缺口。然而,事实上目前世界许多的移民地相对于迁出地而言,并不具备迁入地的经济优势,甚至出现了“反城市化”的逆向移民。移民也并非简单地从事低层劳动,他们有的是艺术家、流浪者(无职业者),还有更多是技术移民、生态移民、生育移民、宗教移民等。人口迁移时的经济、社会制度、市场需求、社会结构等动因乃至家庭影响、个体心理、行为习惯等,都是移民研究的重要因素。

同时,移民如何产生归属感?关于移民文化适应性研究的文献汗牛充栋,研究主要是以移民“个体”、“社区”(如唐人区)、“族群”乃至民族(种族)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移民群体与当地社会的融合方式,其研究大致可以梳理出“熔炉论”和“多元文化论”等多个流派。

“熔炉论”也称“同化论”,学者认为,无论来自何地何种族何背景的移民,要进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一般要经过定居、适应和同化三个阶段,他们要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并通过教育获取社会身份,才能获得社会认可,进而实现同化和融合。而移民与主流社会的隔离程度决定了其经济地位。“熔炉论”强调了主流文化的优势地位。^[7]

“多元文化论”的学者则认为,不同的移民群体可以按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共存于一个国家中。他们保留各自的文化特点和价值观念,并形成独立的隔离生活区,形成隔离区的优势文化地位。其中,文化移植理论认为移民难以完全融入居住国的文化认知环境,他们通过借助本族群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网络,强化本族群内部的社会关系和民族团结。文化包容理论学者则从个体出发,承认移民群体性差异,但是更强调一般个体作为移民的独立性与主体性。文化重构理论则重视移民在追求个性与自我发展中,对当地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的重构。^[8]

人类学者对于移民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上,都将移民视为期望获取最大利益的理性“经济人”。这些理论的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都重在移民对于当地社会的主动性认知和适应,并关注移民如何利用移民群体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取在新的居住地生活的各种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

然而,全球性的迁移成为时代的主题,“人”在时空场域,乃至精神领域,无不处于一种日益见增的漫游状态。人类学的被研究者(稳定的移民、变迁中的移民、被放逐者、自我放逐者、社会边缘者、反城市者)不断地瓦解与重组生活的意义,移民出现更为多元的意义阐释和生活实践。除了常规意义上的永久性移民,短期性的旅游者、侨居者、流浪者,乃至精神上的漂泊者,都归属于移民的行列,其在心理与行为上呈现充溢活力的文化意义。

移民研究应该具有更多情感性的、非理性的意义。以“情感”为联结对移民动因及移民文化的适应性进行思考,可以摈除以往研究的理性桎梏,更关注移民在身份认知上的个体性、随机性、模糊性与飘移性。

三、案例:国际移民理论在厄瓜多尔移民地的不适用性

(一)厄瓜多尔华人移民的动因分析

南美洲厄瓜多尔与中国同样为发展中国家,其华人移民动因与华人移民生活现状相对发展

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截然不同。作为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移民的特殊群体,厄瓜多尔华人移民动因呈现出有异于以往移民观察的独特性,其华人移民研究对于国际移民理论有着现实的补充意义。

厄瓜多尔地处南美洲西北部的高原国度,横跨赤道,四季如春。据统计,目前在厄华人移民(包括华人、华裔)约16万,且呈现缓步上升趋势。华人移民主要来自于台湾、广东潮汕、中山、台山、福建福清、连江等地,另有部分来自东北的辽宁、山东。华人移民经商能力较强,手段灵活,有部分华人移民担任医生、律师、工程师,小部分移民跻身上流社会,但大多数移民仍处于适应阶段,生活较为艰难。对于华人而言,厄瓜多尔在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等方面都并非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移民地,主要体现在:

首先,厄瓜多尔政局极不稳定。厄瓜多尔原属印加帝国,1532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直至1822年才完全脱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成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部分。1830年大哥伦比亚解体,成立厄瓜多尔共和国。^[9]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多年来厄瓜多尔政局动荡不安。前任总统阿尔弗雷多·帕拉西奥在位期间,由于其经济政策损害了部分市民的利益,市民通过游行示威导致其下台。现任总统拉斐尔·科雷亚通过经济手段限制、打压华人,不得人心,致使2010年9月30日厄瓜多尔爆发严重骚乱,抗议当局政策的警察企图“发动政变”。政治格局动荡使得华人移民人心惶惶。其次,厄瓜多尔自然资源丰富,主要是石油、香蕉等;工业以瓷器、造纸等轻工业为主,日用品则依靠进口。由于本国企业较少,尚未发行股票基金,加上大部分物质依赖进口,经济依附性强。现任总统奉行左倾政策,控制减少国际投资数额,致使经济恶化、国库亏空。政府唯有通过严厉惩罚偷税漏税、提高关税等方式弥补国库。这种经济手段导致众多富裕阶层往国外发展,资金外流,经济一蹶不振。再次,近年来中厄关系发生变化,厄瓜多尔排华情绪高涨。主要原因在于厄瓜多尔水电常年由哥伦比亚供应,但是由于哥伦比亚为美国在南美洲的代言人,奉行资本主义,而

厄瓜多尔虽然目前是资本主义国家,其新总统上台之后却奉行左倾路线,与南美洲其他国家一样向往社会主义,导致与哥伦比亚关系恶化,厄瓜多尔不得不自行筹资选址兴建水电站。中国投资了17.3亿协助其兴建水电站,因为贷款需要厄瓜多尔出示担保书,厄瓜多尔对此不满,中厄双方关系恶化。因而,新总统排斥华人,提升华人的商业税,导致华人移民尤其华人商人如坐针毡。

综上所述,对于华人而言,厄瓜多尔并非一个理想移民地。以中国与厄瓜多尔政治、经济实力以及发展态势而言,厄瓜多尔并无优势,华人移民在厄瓜多尔也并非承担本地居民不愿意从事的低层次的劳动力市场,而是以经商为主。我们从几个案例可见厄瓜多尔移民动因的独特性。

案例一:虚幻的“淘金梦”

A君是怀着淘金梦来到厄瓜多尔的。潮汕地区向来人多地少,资源紧张,出国潮经久不衰。蛇头在家乡放话说,厄瓜多尔摆地摊一天可以赚2000美元,只需支付蛇头4000美金佣金便可签证。A君心动了,东筹西借,并与蛇头签订了“半卖身契”,即一个月400美元工资,自己拿200美元,蛇头扣除200美元,直到还完债务为止。然而,抵达当地后他发现与蛇头、乡人传递的信息不符,赚钱机会渺茫,语言不通,生存都成为问题。因为付出许多,他觉得只有赚回成本才能回国,于是留下来艰苦创业。然而前路茫茫。

案例二:飞来飞去的“候鸟”

“潮人同乡会”会长B原是汕头政府公务员,在国内生活优越。因其岳父告知厄瓜多尔充满发财机会,B于20世纪90年代初举家移民至厄瓜多尔首都基多。B到达之后发现事实上厄瓜多尔经济并不景气,岳父仅靠开餐饮店聊以谋生,大失所望。同时由于厄瓜多尔生活单调苦闷,备感失落。如今,B的儿女已经长大成人,现在送往国内暨南大学就读,B则利用其在国内原有的人脉以及厄瓜多尔的华人圈子进行两国之间的一些贸易。

案例三:跳板式的“曲线移民”

C是早年的移民,因其经营有方,目前已经是厄瓜多尔主要的汽车零配件供应商之一。C前日将儿子从国内接到厄瓜多尔,并办理了移民手续,到

户籍管理部门为儿子申领当地身份证,其目的是以厄瓜多尔为跳板,帮助儿子移民美国。尽管厄瓜多尔只是南美小国,经济发展前景远远不如中国,但是其临近美洲,进入厄瓜多尔之后,可以进入美国就读中学、大学,是“曲线移民”的绝佳选择。

由上述案例可见,厄瓜多尔并非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移民地,移民并非只是制度性的推力、拉力的结果。社会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因素造成,人在移民选择时的行为失误,人处于投机心理的推拉逆向移民,以及“候鸟式移民”、“跳板式移民”等非理性移民动因为数不少,这些移民动因在第三世界的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移民中体现出来。厄瓜多尔华人移民动因呈现以下特点:

1.结构性移民。厄瓜多尔的移民是个体与社会结构双重互动的结果。移民动因不仅仅是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的经济差距造成,也不仅仅是移民家庭追求家族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是存在多元化的个体体验。既存在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心理失衡型移民,或者在本国缺乏发展机会转而向外的投机型移民,抑或基于更高境界的精神追求等社会原因造成的慈善型移民,也存在以生育、教育、商业等实际目的为需要的跳板式移民,是一种个体选择与社会选择相结合的结果,属于结构性移民。

2.仿效性移民。厄瓜多尔移民动因的仿效性强。布迪厄的“惯习说”^[10]认为客观环境的变化成为初始移民行为的诱因,持续性的移民行为逐渐为当地人崇尚与追随,渐渐内化为一个地区意识潜在的、具有衍生性的一种行为习惯,并对一代代的人产生影响。厄瓜多尔移民便呈现这样的跟风状况,多是集中表现为家族移民、地区性移民。

3.流动性移民。厄瓜多尔移民的稳定性弱。由于移民前后的想象与现实存在差距,厄瓜多尔华人移民未能产生归属感,从而产生了以其作为跳板的“临时性移民”,向外寻求发展机会的“双线型移民”,以及不断返回迁出地的“候鸟式移民”等流动性状态。

(二)厄瓜多尔华人移民的文化特点

厄瓜多尔华人移民皆是以血缘或地缘为联结的“家”、“家族”乃至“同乡会”为纽带,其移民文化呈现多元特性。

首先,主流文化不具备优势,厄瓜多尔华人移民不是单一地被同化。厄瓜多尔长年作为西班牙殖民地,其民族成分复杂,印欧混血种人占41%,印第安人占34%,白种人占15%,黑白混血种人占7%,黑人和其他种人占3%,没有任何一个种族占据绝对优势。由于华人善于经商,经济地位较高而颇受尊重。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华人经济、文化的优势地位更是日益凸显。但是尽管华人具有经济优势,本地的社会体系也依然良好运转,并未受到华人移民的影响而瓦解。各个种族并未如同美国一般融合为一个具有“国家”认同感的新的民族,他们在本民族内部使用原有的语言进行交流,家庭日常饮食也保留传统的习惯,某些华人住所还依然设置地主神位、祖宗铭牌等进行祭拜,但是在与外族人交流时,华人以流利的西班牙语与本地人进行商贸往来,华人也渐渐接受当地饮食风俗,因此“同化论”不足以完全描述华人移民的文化适应过程。其次,厄瓜多尔并无华人移民聚集的“唐人街”,华人移民四散各处,华人也未能依靠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社会关系等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网络。由于华人平日各自忙碌生计,唯有节假日互寄礼物、聚会以维系家族联结,各种华人社会的文化印记非常淡薄,除了语言、饮食习惯之外,地方性文化作为身份印记不能成为维系华人纽带的认知方式。由于未能形成强势有力的文化特色,华人没有自属的独立社区,不存在“文化移植”现象,文化多元论亦不足以完全阐释在厄瓜多尔华人移民的文化特性。下述两个案例隐约可见华人移民的多元文化认知。

案例四 狂热的宗教徒

D君属于厄瓜多尔华人移民的特殊群体,他的身份为“传道人”。这是一个名叫“耶和华见证人”^①的组织“伯特利”的分支机构,他们在传教中

^①耶和华见证人基本被确定为“反对基督信仰和圣经教导的异端”。参见 带子《揭开真相——耶和华见证人》《家信》,2001年第18-22期。

发现许多华人心智未开、偶像风行(指的是求神拜佛),是最难打进的一个群体,他们希望通过传教帮助华人,所以近年来大规模地在华人当中传道,他们虽然以欧美、土著人为主,但是聚会的整个活动,从赞美诗、读经、分享经文到结束祷告,甚至全球发行的传教经文、杂志,全部以中文进行。华人到宗教组织寻求新的身份认知,结成友谊。“伯特利”作为一种流行的宗教组织成为使华人产生精神纽结的新的方式,整个敬拜过程充满神秘与狂热,他们在团契与主日敬拜中释放宣泄感情,从而结成一种新的弟兄姊妹情感。

案例五:被同化的“临时移民”

E君是位年轻的东北小伙子,来厄纯属偶然,因为他认为落后的国家并非完全没有机会,相对一个经济饱和的国度而言,似乎意味着更多潜藏的机会选择,可以利用落后地区所不具备的知识、技术和眼光攫取财富。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华人圈子,而是因为娶当地媳妇生意做得开,娶了一位印第安姑娘 Mercy Magaly Porras Paredes,组成一个混合家庭。E君负责拓展业务,妻子负责看管门店。E君并没有将厄瓜多尔作为终生居住地,而是准备通过投机获得第一桶金,而后回归故土。像E君这样的华人移民不为少数,他们手持台湾护照、大陆护照,并未取得厄瓜多尔国籍,甚至认为厄瓜多尔国籍不如中国国籍,完全没有入籍打算,但是他们在该国居住多年,已经完全被本地居民所同化。

因此,在厄瓜多尔华人移民的调研中,我们发现人类学意义上的华人移民认知不能简单地以空间迁移、户籍进行身份认知,而是可以以“情感”为主线,从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1.日常的身份认知。对于人类学研究而言,华人移民研究便是要记录迁移中的人们在行动与思想上建立起来的形式各异的“家”——归属感。当一个人习惯了一种认知环境并且接纳了日常生活中的风俗惯例,能够使自己的身份认同获得很好的表达与交流,那么这个人就有了家,反之,当这种认知环境消失的时候,这个人就无家^{[11]136}。一些厄瓜多尔华人移民并未取得该国国籍,但是他们已经融入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接受异国文

化。从这一层面讲,他们是实质上的移民。

2.共同的文化印记。无论人类如何迁移,文化是移民身上不可磨灭的印记,是确认华人移民身份的证据。在超越以往传统(根据族群、宗族、地域或者国籍)对身份分类和确认的分析方法中,一系列具有地方文化特性的社会实践,包括社会交往、语言、服饰、宗教、记忆与神话,或者某种仪式成为辨识族群归属的标志。厄瓜多尔华人虽然其原有的文化印记淡薄,但是他们却通过一种新的宗教形式为文化纽带,形成新的文化族群。

3.想象中的移民。人类天真地认为存在着原始的根,寻根是人类精神上一种常态,所以人类身份一直在摆脱依附与寻求依附之间游移不定。埃德蒙德·利奇指出:“个体在一生当中都处于不断超越社会文化的边界,无论这一规范是否已经被明确指出,或者被制度维护者明令禁止。”^{[11]132}所以,当进行华人移民观察时,事实上并不具备明确的分类界限,人们更多的是根据不同的身份、关系、仪式、群体、文化、环境等来想象生活和身份的,是一种“想象中的移民”。

四、厄瓜多尔华人移民 个案对现有移民理论的修正补充

移民不是单一地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迁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诱因固然是一种移民拉力,家庭婚姻因素、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个体价值取向等情感因素日渐成为移民的主要动因。厄瓜多尔宗教组织中的华人移民虽然也是因为社会组织的推动、宗教文化的联结等因素移民,但这些只是表层的客观因素,更深层面来自于主观的宗教信仰、道德追求等心理因素,这是以往移民理论所忽略的。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日益强化着自己“封闭的边界”,成为移民的“阻力”,发展中国家则抛出橄榄枝,提供给移民发展机会,成为移民的“拉力”。这种国际力量与社会群体、个人力量的综合博弈使得移民的“推力”、“拉力”和“阻力”理论产生新的研究切入点。单一的推拉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日益多元的移民现象。

移民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呈现多元观照。随着人类社会环境日益多元化,没有什么

单一的、固定不变的,没有什么是绝对真实,分类、界限变得模棱两可;身份、族群不再是固化的存在,而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身处异国他乡,厄瓜多尔华人移民的无家之感油然而生。移民精神上漂泊无依,于是孜孜不倦地追寻着新的精神皈依,从而在新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了一套新的信仰、故事、情感,并使之成为维系移民群体文化的纽带,这一切构建了一种“想象中的移民”。华人移民的适应能力并不受到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的差异影响,其对于各种文化是包容的,不是简单的一元同化,亦非二元认知“本国-外国”“本文化-异文化”,而是具有四海为家的特点,文化认同不具备明确的边界。

华人移民作为时空的舞者,正是历史记忆随着时间变迁在空间的流动与配置,其研究彰显人

类学对于“人”的终极关怀和理性思考。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世界的命运便是无家可归。世界性的迁移是这个时代的主流,侨居、放逐、流浪、劳动移民、旅游、城市化和反城市化都是我们时代的核心文化主题^[12],走向“开放的社会”已成共识。因此,华人移民不是一个具化的群体,而是一个情感化的想象共同体,是具有多元身份的文化体。华人移民研究当以时空为轴,人文为本,放置于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展开。此外,与移民文化有关的交叉问题,家庭因素、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个体价值取向等日渐成为华人移民文化研究的关注点,女性移民文化、移民与身体技术等等,亦呈现有趣的视点,打破学科界限将是华人移民文化研究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 [1] 国际人口学会.多种语言人口学辞典[M].比利时列日:联合国国际人口学会出版,1982.
- [2] 章必功,傅腾霄.移民文化:文化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论题——兼论深圳移民文化特色[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7.
- [3] Ravenstein, Ernest George. the Laws of Migration [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85, 48(2): 167-235.
- [4] 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 [5] 张继焦.亚洲的城市移民——中国、韩国和马来西亚三国的比较[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 [6] 成谢军.农村城市化中人口迁移问题研究——基于刘易斯与托达罗理论的分析[J].特区经济,2009(1).
- [7] 甘怀真,贵志俊彦,川岛真.东亚视域中的国籍、移民与认同[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8.
- [8] 周大鸣.多元与共融:族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9] 张颖,宋晓平.厄瓜多尔[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30.
- [10]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11] 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M].鲍雯妍,张亚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 [12] Minh-ha, T. Other than Myself [M] // G. Robertson et al. (eds). Tales. Narratives of Home and Displacement, London: Routledge, 1994: 13-14.

(责任编辑 汪小珍)

media. Represented by Weibo, WeChat and Apps, social media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of Web2.0 has changed the one-way information flow, urging the government to transform its function and to strengthen its service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throug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ocial media in the public sectors at home and abroad, analyzes its function and role in molding the wall-free government, inspir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in the mobile Internet era.

Key words: social media; public sector;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Irrational Factors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Ecuador

DU Jie-li

(Shenzhen Polytechnic,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Abstract: Taking Chinese immigrants in Ecuador as a focus,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definition of immigrants in view of the anthropological concept. It not only considers Chinese immigration as moving from one space-time to another, but also nourishes more emotional factors. Chinese immigrants is often an "imagined community", and irrational factors are important immigration motivations for most migra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s is neither monist assimilation nor a dualist "my culture - other cultures" formulation. It is a kind of pluralism with indefinite boundaries.

Key words: migrant; irrational factors; processing anthropology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Li Hongzhang's Bandits Suppression in Guangdong and Guangx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Late Qing Government and I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ces

LI Fa-g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Abstract: The bandits problem was a major social problem in Guangdong and Guangxi during the mid- and late Qing Dynasty, and affected the government's control over the region. It became an important concern for all the governors. By the end of 1899, Li Hongzhang, as the Viceroy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started an extensive suppression against bandits. The first reason is the problem of theft and robbery was getting worse in Guangdong and Guangxi; secondly,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and revolutionary forces needed to be suppressed; finally, it was also a strategy to coordinate the Sino-British relationship.

Key words: Li Hongzhang; Viceroy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bandits suppression; causes

On the Conferment of the Three Mountains Lords in the Song Dynasty

CHEN Jia-zhen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worship of the Three Mountains Lords has a long history in eastern Guangdong. However,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reason why the Lords, originally natural deities, became local deities and finally deities of the whole country, remained a mystery. So far, "the early Song theory", "the late Song theory" and other explanations logically contradict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Liu Ximeng's Ming Kuang Temple Record and other documents. Based on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data, the conferment of the Three Mountains Lords should have taken place during the period of Emperor Zhenzong of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Chaoshan;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Christian; church construction; localization

本刊授权律师声明

本刊谢绝一稿多投,抵制学术不端行为,若有侵犯他人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权利所引起的一切不良后果,本刊不承担任何侵权及连带责任。本刊对来稿有权修改,并有权在网上发布、结集出版,稿酬不另计。除注明不得转载外,其他报刊、网络等媒体转载、摘编本刊作品均需注明出处。否则,本刊保留追究相关侵权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声明

广东丰粤律师事务所
谢丰凯律师